

用好财税金融抓手 夯实就业底盘

曲哲涵

岗至新生产线。这充分说明,短期纾困稳住岗位、技能培训实现转型缺一不可。各地需持续加大职业技能培训财政投入,帮助劳动者适配产业升级、对接新兴赛道,实现从“稳住就业”向“高质量就业”跨越。

要统筹好“智造更新”与“稳岗扩容”的关系,兼顾产业升级与就业吸纳——

培育新质生产力、改造传统产业、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是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实践中,不少企业依托财政奖补、技改贴息、税收优惠完成智能化改造与设备升级后,产能效益稳步提升,却因智能替代出现用工吸纳能力明显下滑的现象。创新发展的落脚点是保障民生,绝非单纯追求产能与利润增长。对此,财税金融需优化扶持导向、校准评价标尺,不再单一以产业赛道、产能规模、产值利税作为扶持评判标准,而是将企业稳岗规模、新增就业岗位、用工吸纳能力纳入核心考核体系。同时,重大基建、城市更新、产业投资项目立项前,须严格落实就业影响评估,优先布局就业带动性强、产业链吸纳空间广阔的项目,善用以工代赈政策工具,在经济提质与岗位扩容之间找准最优平衡点。

要把握好就业“主力军”与“生力军”的关系,兼顾存量稳控与增量培育——

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是吸纳就业、承载灵活用工的主力军。财税金融要持续减负纾困、精准赋能,依托常态化减税降费、低息信贷、风险补偿等机制,稳住经营主体、守住存量岗位,筑牢就业缓冲防线。稳存量更要拓增量,应引导财政、金融资源向创业孵化平台、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倾斜。依托创业担保贷款、供应链金融赋能大众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以新业态催生新岗位。同时,完善灵活就业保障体系、健全失业风险分担机制,托举各类新型就业形态,持续壮大就业领域生力军,形成存量稳固、增量扩容、质量攀升的良性循环。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需要财税金融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协同共进。未来,要持续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刚性,将就业评估作为财税金融新增举措的前置门槛,推动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政策深度协同,持续优化政策工具、精准调配各类资源,多方联动夯实就业底盘,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持久温暖的民生动能。

平均来看,中央财政每奖补1亿元

可撬动新发放创业担保贷款约50亿元

支持约1.75万人创业

数据来源:财政部

财经深一度·增强金融服务多样性普惠性可及性

7月,独龙江畔,一丛丛苹果紧贴沃土生长,如同温润的红玛瑙。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巴坡村种植户王世荣蹲在林下查看挂果情况,满心踏实:“多亏农信社‘苹果贷’托底,今年再次扩种。”一笔产业贷款,一间流动的“背包银行”,是云南普惠金融深耕边疆的生动缩影。

山高谷深、村寨分散,“九分山半分坝”的云南,极易出现金融覆盖盲区。如何避免越缺钱的越贷不到款?云南金融从业者背起帆布包、走进深山,把信贷活水送到群众身边。

贷向哪? 聚焦特色优势产业

郁郁葱葱的苹果,如今是独龙江群众公认的“绿色资产”,可早些年却让王世荣一筹莫展。

“发展产业必须要规模化,要规模化就需要足够的资金。”作为村里首批发展苹果种植的农户,王世荣计划扩建示范基地、带动全村规模化种植,可政府配发的种苗有限,自主采购的资金缺口迟迟无法补齐。深山农户缺少厂房、房产等抵押物,贷款难成了扩种路上的“拦路虎”。

群众急难愁盼就是服务靶向。云南省农村信用社怒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贡山独龙江支行“背包银行”党员服务队背着业务资料、移动终端3次上门,快速完成核验、审批、放款。贷款如同及时雨,支撑王世荣迅速扩大了种植规模,如今巴坡全村苹果种植面积突破2万余亩,小苹果成了独龙江畔的“金果果”。

自2010年设立网点,贡山独龙江支行员工常年扎根峡谷乡村,走村入户累计发放贷款1138笔、投放资金8197.79万元,瞄准的重点产业就是苹果;全行总授信12708.68万元,其中专属“独龙江共富贷”投放2552.30万元。持续精准滴灌,推动独龙江苹果、独龙牛等产业从政策“输血”转向内生“造血”。不仅是独龙江,保山市昌宁县坚果产业也有明显资金错配痛点:种植户收购季急需短周期周转资金,加工企业则需要长期信贷保障仓储。邮储银行云南省分行创新推出“极速贷+农牧贷+小微易贷”产品矩阵,纯信用极速贷实现线上秒批,小微易贷适配企业长周期经营,邮储银行保山市分行全链条累计放款1.5亿元,打通乡村全面振兴产业资金堵点。

围绕云南“1+10+3”高原特色农业布局,普洱“咖啡贷”、弥勒“葡萄贷”相继落地。县域金融因地制宜、精准滴灌,山间果蔬、林下作物,依托金融扶持变成致富抓手。截至2026年5月末,云南省涉农贷款余额1.44万亿元,同比增长8.17%,金融活水持续激活乡村全面振兴动能。

咋增信? 创新多元信用体系

早些年,偏远地区群众发展产业双重受限:无有效抵押物,缺少信贷记录,融资难长期制约增收。

独龙江产业稳步发展,背后扎根村寨的农村信用体系功不可没。为破解困局,云南省农村信用社2019年在独龙江启动“整乡建档、独龙族整族授信”专项行动。18名员工立下军令状,39天徒步走遍全乡农户,逐户摸排家庭、产业、收支情况。

全覆盖走访后,全乡评定6个信用村、386户信用户,整体

业优先战略,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提升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细化落实相关部署,推动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把就业考量贯穿消费刺激、政府投资、专项债投放等各类举措实施全链条,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财税金融如何精准发力稳就业、持续放大实施效能?要平衡好“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的关系,兼顾纾困解难与提质赋能——

财税金融工具既要兜住民生底线、缓解短期就业压力,也要着眼长远发展、锻造劳动者核心竞争力。针对零就业家庭、妇女、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等重点就业群体,持续用好稳岗返还、创业补贴、税费减免、低息担保贷款等工具,化解阶段性失业风险。但纾困举措仅能解一时之急,产业迭代、新旧动能转换持续重塑就业市场,技能短板已成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主要制约。湖南永州一家电子制造企业布局5G新产线后,原有一线员工技能难以匹配新生产流程,人员流失风险凸显;企业凭借按90%比例返还的11.83万元稳岗资金,系统开展新型学徒制实操培训,30余名工人完成技能升级,顺利转

授信6000万元,建成怒江州首个“信用乡”,独龙族成为全国首个实现整族授信的直过民族。农户凭信用即可“一次授信、随用随取”,不用抵押担保,一纸信用评定成了群众致富的“通行证”。

在广袤的云岭大地,云南金融机构正将这一“信用红利”不断放大。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份信任化作了“半边天”的托举。中国人民银行德宏州分行推广“整村授信”模式,为农村妇女提供“一对一”顾问服务。瑞丽市勐卯街道新民村村民张晓娟经营养猪场,金融机构主动上门建档授信,多年来持续提供信贷支持,将贷款额度提高至50万元,让她从几十头的养殖规模发展到如今的200余头。

针对特色种植主体缺抵押、融资难问题,围绕县域特色产业布局,农业银行红河分行2024年创新推出纯信用产品“蓝莓贷”,适配蓝莓种苗、种植、冷链加工全产业链。该产品投放短期内破亿元,近3年累计为蓝莓产业放贷7亿元,现有贷款余额1.9亿元,纯信用贷款超8000万元。

从人工户建档到数字化平台赋能,云南信用体系建设持续下沉。截至2025年12月末,全省评定信用户784.23万户、信用村8507个、信用乡镇946个,建档农户信用贷款余额达2912.83亿元。云南正以信用体系建设为普惠金融筑牢根基,让信用成为边疆群众“硬通货”。

在独龙江乡,金融服务的形态一直在变。上世纪末,银行员工背着算盘、账本和干粮翻山越岭,那是第一代“背包银行”;如今,背包里装上了智能终端和便携打印机,火塘边的“金融夜校”里,不少乡亲学会了手机转账。而在暴雨冲毁江堤的日子里,银行员工在临时安置点搭起“帐篷银行”,更是解了受灾农户的燃眉之急。

山区群众不仅缺资金,更缺金融知识与操作能力。云南金融行业坚持主动下沉、上门送服务,深入边境村寨宣讲政策、普及反诈知识,补齐沿边服务短板。

咋服务? 多做送上门的金融

在独龙江乡,金融服务的形态一直在变。上世纪末,银行员工背着算盘、账本和干粮翻山越岭,那是第一代“背包银行”;如今,背包里装上了智能终端和便携打印机,火塘边的“金融夜校”里,不少乡亲学会了手机转账。而在暴雨冲毁江堤的日子里,银行员工在临时安置点搭起“帐篷银行”,更是解了受灾农户的燃眉之急。

山区群众不仅缺资金,更缺金融知识与操作能力。云南金融行业坚持主动下沉、上门送服务,深入边境村寨宣讲政策、普及反诈知识,补齐沿边服务短板。

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这种主动上门的服务化作了村口最热闹的“金融窗口”。富滇银行将普惠金融服务站开进农资店,村民白天买农资,傍晚就能在这里办业务、学金融。客户经理带着移动终端上门建档授信,手把手教村民使用手机银行,让老百姓真正“会用、敢用”金融服务。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独克宗古城,湖南创业者周婷正为客栈扩建资金发愁,工商银行迪庆分行客户经理吹批主动上门,两天便发放200万元“云旅民宿贷”,助她搭上了丽香铁路的旅游热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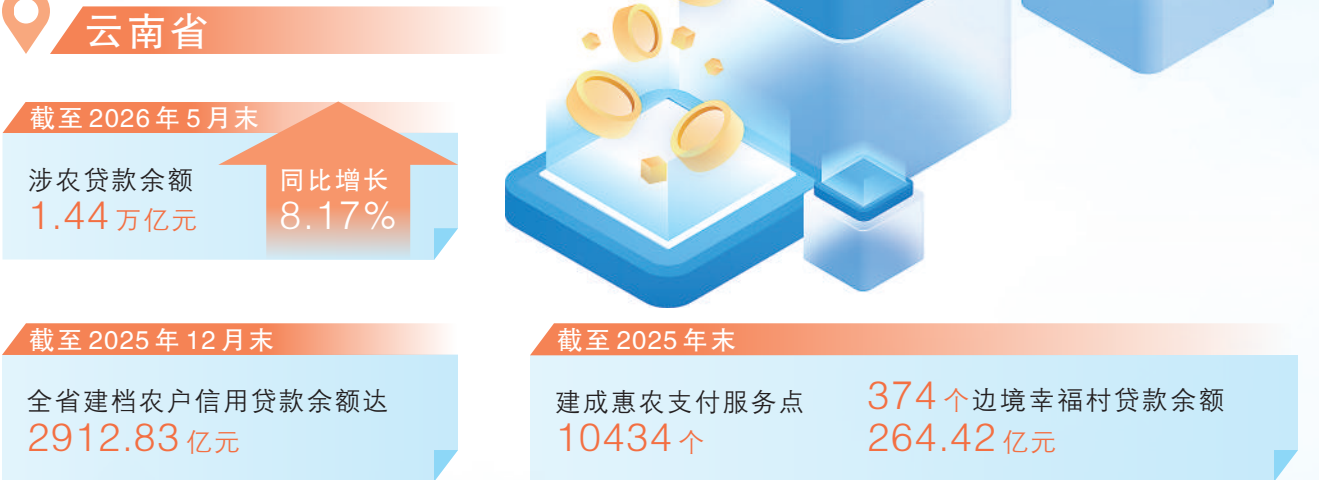
云南搭建“固定网点+自助机具+普惠服务站+移动支付”立体化服务网络。截至2025年末,建成惠农支付服务点

“背包银行”托起致富梦 ——来自云南普惠金融的观察

本报记者 杨文明

10434个,374个边境幸福村贷款余额264.42亿元,一张覆盖深山、边境、村寨的惠民金融网越织越密。

磨损的胶鞋、满载业务资料与终端的帆布包,正持续助力金融活水滋养云岭大地。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李滔表示,云南将持续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优化和加强县域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坚持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丰富信贷供给,下沉服务重心,精准赋能民营小微、乡村全面振兴、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



记者手记 主动作为 让金融更好满足发展所需

从“等客上门”到“主动问需”,云南金融行业通过主动作为,让金融更好满足发展所需。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让金融更好满足发展所需,不仅是金融服务的题中之义,更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当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田间地头,乡村全面振兴的动力才能更足。

普惠金融不是盲目放贷。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滴灌,鼓励将有限的信贷资金投向乡村全面振兴重点产业一线,怒江苹果、孟连牛油果、昌宁坚果,云南绝大多数县市主导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支持。

长期以来,偏远山区农户等群体融资难,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银行不知道谁缺钱、不敢放贷,缺钱的人

跟着历史学经济

“义利之辨”及其当代意义

熊昌钺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义”“利”的观念很早就存在于中华民族的意识之中,并在字义流变中逐渐显现出评判各类问题和行为的规范性内涵。随着春秋时期社会经济革新持续冲击礼乐秩序,私有制加速个人“私利”与集体“公利”分化,“义利之辨”衍生为贯穿经济伦理发展的一大基本问题。尽管儒家、墨家、法家等对“义”“利”内涵存在多种解读,但总体均要求新兴私人经济从属于政治和伦理秩序,接受国家权力和道德规范的制约。

秦汉以降,传统经济逐渐被塑造造成赋纳税输送与物资交换贸易相嵌合的贡献赋体制。根据儒家对理想秩序的构想,包含物质财富和百姓生计的“利”被要求遵循关乎道德规范和政治秩序的“义”。随着唐宋民间市场的快速发展,社会经济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动。在传统生产力水平较低、缺乏社会再生产条件的约束下,“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持续存在张力。明清时期,具有反传统倾向的士大夫更是在国家“理财”是否与民争利的话题上,开始从制度层面反思“义”和“利”的

主体,讨论国家“理财”与社会“公利”是否等同,也更加强调“以义主利”和“以利佐义”。

近代以来,“经济”逐渐被视为国家体制和社会体系的一个专门场域,时人开始意识到传统经济与现代市场的底层逻辑差异,尝试用西方合理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原则改造传统“义利观”。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流行,极大改变了国人对社会组织原则的认知,逆转了代表物质财富的“利”与代表道德规范的“义”在社会运行中的相对地位。发展经济的“利”由此内嵌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无须再从“义”中寻找合法性根源。然而,深陷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也意识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流弊,转而重新思索“义”的价值。这使得“利”在传统“义利之辨”被彻底解构后,并未远离“义”,而是试图将公平分配融入经济现代化进程。

现代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才真正具备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条件。“义利观”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也并非简单地由“重义轻利”转向“重利轻义”,而是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轮驱动中,转向“义利兼顾”“义利并重”的新义

利观,致力于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的实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价值伦理方面,“义利之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基础。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需做到“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这实际正是对传统义利观的创造性转化,强调经营主体要坚守道德底线与社会责任,维护市场秩序。二是在经济运行中,“义利合”的思想也启示我们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防止贫富分化,体现公平正义。三是在发展模式上,正确的“义利观”有助于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历史经验表明,过于强调“利”容易导致市场失灵与社会危机,而过于侧重“义”则会影响个体积极性、抑制经济活力。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需要做到“义利兼顾”,既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又要注重改善民生与照顾社会整体利益。这不仅体现在国家治理中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国际交往中也需要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

综上,“义利之辨”在当代的重要价值和启发意义,并不在于简单套用“重义轻利”的取向,而在于通过其创造性转化,构建兼顾个体与整体、效率与公平的经济伦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伦理规范、制度平衡与发展导向,真正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报记者葛孟超、《国家人文历史》记者周斌采访整理)



湖北省十堰市房县西关印象街区,这里曾是贯通鄂豫川陕的古盐道枢纽。 张启龙摄

本版责编:刘温馨
版式设计:蔡华伟